

教育学的引入（1900—1919）

（一）

“教育学”学科的设置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中大败于日本帝国主义。“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师范教育在我国的议论与出现，就涉及教育学这门学科或课程了。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撰《论师范》一文，主张自办师范学堂。“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并举日本师范学校设置有教育（学）学科^②。这也许是我国师范教育议论的发端。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页。

^②梁启超：《论师范》，载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983页。

同年，盛宣怀奏请在上海筹设南洋公学。1897年，先办师范院（即师范学堂），说“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因此，“先设师范院一学堂，延订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以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①。它是“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业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②，又仿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诲。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相传为梁启超手笔，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首都）设大学堂，并主张设立府、州、县学堂，省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三级制^③。同年，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在开办官书局的章程里，本来就计划设立京师大学堂的^④。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进展，康有为又提出：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⑤。与此同时，御史王鹏运又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2月，光绪以“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并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详细章程。1898年，岁在“戊戌”，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在诏书中又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妥速议奏^⑥。但顽固派仍然拖延，康有为焦急上奏，光绪于6月26日再次发出上谕，严令迅速复奏，毋稍迟延。这样，只得把梁启超请来，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

①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154页。

②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附章程）》，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

③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433页。

④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154页。

⑤⑥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光绪：《明定国是诏》，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页，17页。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起草《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①。1898年7月4日，光绪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②。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正如季羨林的题词：“巍巍上庠，世纪风云”^③。

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有“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的话。但在《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以前，这个“师范斋”始终没有开办。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备时，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光绪被囚禁，史称“百日维新”。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止，只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迨189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8月上旬，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同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佯称也要“变法维新”，于是在1902年1月下令恢复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所谓“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师范馆”为速成科的一门，修业4年。所谓“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④。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并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其《钦定中学堂章

①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45页；《附录：康有为记章程起草经过》，载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4—665页；罗惇融：《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载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57—161页；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3—195页。

②肖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③《北京大学学报》（庆祝百年校庆专辑），1998年第2期。

④《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载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

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以 1902 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为起点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馆为其前身，为其最早的名称^①。师范馆于当年 10 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②，而且 4 年分年规定内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习”，还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③。12 月 17 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实际上，在 1902 年前后，已经设立了一些师范学堂，例如武昌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全闽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1905 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山东师范学堂、龙门师范学堂，等等。它们都设教育学课程。这些师范学堂都是“官立”的。

张謇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堂（学校）于 1902 年开始建校，1903 年开学。“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④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 4 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传记、主义、方案要略）；教育学（授教育宗旨，智育、德育、体育、伦理学大要、教授原则）；“学校设置、编置、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之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为学校管理以及教育实习）。其速成科修业 2 年，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

^①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 版，第 1 页。

^②当年关于“课程”，或称之为“课程门目”，或称之为“科目”，或称之为“课目”，或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课”，等等。当年关于“教育学”这门课程，或称之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或含教育宗旨、教育原理、教育法令、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论、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学堂参观（即教育见习）、教授实事练习（或称实事授业，即教育实习），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大要、伦理学大要、辨学（论理学）大要等。

^③《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载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760—762 页。

^④张謇：《通州师范学校议》，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 989 页。

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为“教育管理、实习”。寻常师范科和速成科都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①。

《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所谓“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所谓“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当然，“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所谓“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根据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师范分“初级”和“优级”两级。自此我国师范教育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制。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5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课时数。那时初师的教育学，规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含心理学大要，现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义，辨学大要（或作“辩学大要”，按：即论理学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以及“实授业”

（按：即实习）^②。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四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课时数，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授练习”（按：即实习）^③。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1904年按《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称为“优级师范科”，分四类：称国文、外国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农学部。各部都设教育学、教育法令和学校卫生课程。

当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的“主课”中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英、法、俄、德、日文学门的“补助课”中都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门，也列“教育学”为“随意科目”。而《奏定进士馆章程》规定第一年和《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第五年学习“教育学”。这反映当年泱泱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

^①②③ 《通州师范学校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载朱有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18页，224—234页，248—257页。

以下的概括是描述了当年真相的：“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惟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惟一之急务矣。”^①

王国维在 1906 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时，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质询张之洞，是不是以为哲学为有害之学？哲学为无用之学？外国哲学与中国古来学术不相容？在当年有这样的见地，真是寥若晨星。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②。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

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 1907 年 3 月 8 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才取得地位的。“三八”是 1910 年定下来的“妇女节”，这倒也是一个巧合了。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

西方教育学，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在清末两个《学堂章程》之前，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可是，两个《学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我国师范教育计划的进程。

(二)

教育学的译介与编著

这个时期，各种版本的教育学，陆续出现。它们主要凭借两条途径。

一是翻译。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时尚，包括翻译日

^①《时报》：《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1904），载朱有璩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75 页。

^②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2 册），中华书局，1928 年版，第 30—37 页。

本的教育学教师的讲义。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则“吾国教育尚在幼年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①二则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对便当。三则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门户大开，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变革自身教育，已见成效，颇有为他国借鉴的价值。所以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引进教育学及有关教师的首选国家。真如张之洞说的：“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②云云。

由于留日学生多，学习日文的人多，翻译力量强，因而教育学译文甚多。例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教育学》，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就分别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按：兰因即莱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的译文，分别发表在1902、1904、1906、1907年的《教育世界》上。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洁译的《实用教育学》，刊登于1906—1907年的《学部官报》。直隶学务处办的《教育杂志》（1907年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在1905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的《教育学讲义》；1906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1906—1907年，连载邓边朕、诗女史译的《家庭、学校通用教育学》和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笔述、韩梯云节修的《教育学讲义》；1907—1908年连载佐口美都子著、蔼辰译的《女子师范教育学》；1911年发表柳政太郎著、蔼辰译的《实际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1910年第2卷第9期，刊载了张世杓的《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授法举例”；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于1914年7月号，发表了欧化的《十九世纪大教育家海尔巴特之学说》（按：海尔巴特即赫

①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65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载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尔巴特),等等^①。以上是刊物上的。

又如 1902 年,上海文明印书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作新社出版成濑仁藏著、杨迁栋、周祖同译的《女子教育论》。1903 年,移山堂出版中岛半次郎著、田吴炤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两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和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广智书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冯霏译的《教育学问答》;三江师范学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1904 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1906 年天津官书局印行);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著、季新益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丛编本收入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1905 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伊泽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译的《教育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 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述,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教育学》。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同年,群学社出版(三版)植田荣次著,陈宪熔、许家惺译的《女子教育学》。1911 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中岛半次郎编著、韩定生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中华书局于 1913 年出版大瀨甚太郎著、宋嘉钊译的《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4 年出版顾倬译的《师范学校教育学》;1915 年出版(二版)大瀨甚太郎著,刘本植、周之冕译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等等^②。以上是出版的书籍。

二是自己编著。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原作推敲、涵泳,由领会、变通而编著。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为江苏师范学堂学生讲授),教育世界社 1905 年印行;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 1906 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

^{①②} 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 年第 2 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 年第 3 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5 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682—685 页,等等。

书》，1907年湖北官书处出版；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广智书局1907版；侯鸿鉴的《教育学》，无锡速成师范学校1908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学》（沈恩孚、顾倬校订），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蒋维乔的《教育学》（初级师范课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中华书局1910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讲义》（据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昌明公司1910年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3年出版了周维城、林壬的《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出版了张毓骢的《教育学》（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杨保恒、蒋维乔校，据森冈常藏等人著作）、张子和的《大教育学》（高等师范学校教科书，据松本孝次郎、松浦杵作原本）；中华书局于1914年出版了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彭清鹏的《实际教育学》，以及宋嘉钊、张沂的《教育学教科书》（据小山左文《实用教育学提纲》），1915年又出版了周维成、林壬编的《实用教育学讲义》^①，等等。

谈到自编教科书，不可不提及商务印书馆。当时，就教育学类教科书来看，尤以商务印书馆的自编教科书在门类、数量、质量上居领先地位。李泽漳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了商务印书馆对清末教科书出版的贡献：“民营的出版业在革新运动的后期，不仅是在出版界居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新教育的推行上也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虽然颁布了学堂章程，但借以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时，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真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当时的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我们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确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②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了一批硕学专家，如蒋

^①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七十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等

^②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下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4页

维乔，当时被聘为该馆的常任编辑，1909年，他在翻译了日文本《新教育学》的同时，自行编写了《教育学》，在当时甚有影响。

以上两条途径，从现象上看，无不依赖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教育学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至少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教科书形成了中国教育百年中的第一次热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其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不少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这里以《直隶教育杂志》发表的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义》的“目录”为例，比照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体系，便可知其沿承关系。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在“绪论”后分三编：“第一编，教育的一般目的”，其中包含目的论和管理论；“第二编，兴趣的多方面性”，为教学论；“第三编，性格的道德力量”，为训育论。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他把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分为管理、教学和训育。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目的—手段体系，这是中外早有定论的，况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全称”是《从教育目的推论出来的普通教育学》。两者何其相似乃尔。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义》正是分为目的论（包括：1. 教育确立目的之必要；2. 通俗的见解；3. 历史上诸说；4. 伦理学上诸说）与方法论（养护论、教授论）两部分^①。又如1906年印行的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的《教育学》共分四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教育之目的；第三编教育之方法，下分养护、教授、训练、教育之准则四部分；第四编教育之场所^②。这虽与赫尔巴特教育学有一些形式上的差异，但在内容的主旨上仍遵循赫尔巴特教育学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再看我国张毓聪于1914年编的《教育学》，全书共分六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目的论；第三编方法论一，教授；第四编方法论二，训育；第五编方法论三，养护；第六编教育之种类及处所^③。这种体系也大致囿于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框架。至于具体内容，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的形式步

① 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教育学讲义》，《直隶教育杂志》，1904—1905年合订本第1期，直隶学务处。

② 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编辑：《教育学》，1906年，江宁学务处。

③ 张毓聪编，杨保恒、蒋维乔校：《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骤”(formal steps of instruction), 通常称为“五段教授法”(后来叫“五段教学法”), 更是吸收无遗。

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分为明了、联络、系统、方法 4 个阶段。他的学生戚勒(T. Ziller), 于 1863 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和一个师范研究班。戚勒成为赫尔巴特学派的领袖。后来与另一位赫尔巴特的学生斯托伊(K. von Story)创建了“科学教育学会”, 出版教育年鉴, 宣传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戚勒把赫尔巴特教学过程的第一阶段“明了”化为“分析”与“综合”, 于是成了当年所谓的“五段教授法”。戚勒的学生莱因(W. Rein)于 1885 年接替斯托伊在耶拿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和研究班, 耶拿大学成为赫尔巴特研究的国际中心。莱因不仅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核心人物, 而且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年国际上教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莱因又改“五段”为: 预备、提示、联络、概括和应用。后来通行的是莱因的“五段教授法”。波多野贞之助是这样阐述“教授之方法”的: “有三段法: (一) 领受, (二) 理会, (三) 应用。又有五段法: (一) 预备, (二) 提示; 以上两段括于领受。(三) 比较, (四) 统括; 以上两段括于理会。(五) 应用。”^①

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 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五段教授法初行, 教学上好像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当时我国的实施, 除“五段”外, 也有“四段”、“三段”的^②。人们几乎把这种教授法奉为宝典, 到了痴迷的地步。陈宝泉曾谈到: “前清末造, 初兴学校的时候, 真不知教授法为何事。曾忆初到日本, 听教师讲五段教学法时, 以为用科学的方法, 发展儿童的本能, 实为新教育之最大特色。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 以及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 殆无不是适用五段教学法原理的。”^③ 当时, 如《教育丛书》(罗振玉编, 教育世界社印行), 1901 年刊行初集的第 1 册, 称赫尔巴特(当时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等)为“教育改良家之泰斗”, 说他的“教育之法, 依统编定, 真全体阔深肃括, 其各部周匝致密, 升教育学于科学之地位, 而创立今日

① 波多野贞之助讲, 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教育学讲义》,《直隶教育杂志》, 1904—1905 年合订本第 1 期, 直隶学务处。

② 俞子夷遗作:《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 二、赫尔巴特五段法》,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87 年第 4 期, 第 55—58 页。

③ 康绍言等编译:《设计教学法辑要》,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陈宝泉所作序。

之教育学”。初集的第4册为《教授学》专集，详细叙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并附有6种学科的“教授案”。《教育丛书》的第3集，为《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是据中岛端译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转译。当时还没有引进赫尔巴特的完整的作为学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学》。他的《普通教育学》，是多年后才由尚仲衣据费尔金夫妇（Henry M. & Emmie Felkin）1892年的译本《教育的科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转译的（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也有“万有文库”本3册，1936年版）。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一份试题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根据，试阐其理。”^①可说试题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学部成立于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的教育学试题，其中一题为：“莱因瓦（按：即莱因）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②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

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以近代而言，西方其他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如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斯宾塞、尼采的教育思想，以及拿托普（P. Natorp）的社会教育学等。特别是由蒋维乔译的日本吉田熊次著的《新教育学》，是与“已往之教育学”即“十八世纪之个人主义为立脚地的教育学”相区别，介绍了西方社会教育学说的教育学。它意味着教育学不仅要着眼个人的发展，同时要关注社会的进步，开了教育学的新局面。当然，在影响上，这些都不能与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匹敌。不过，它们多少阻遏了赫尔巴特学派独占中国的教育学天下。我国当时的教育学画面还是有其色彩的。

1892年，由莱因的美国学生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C. McMurry & F. McMurry）等发起，在美国组成“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 Club）。1895年，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简称

^{①②} 朱有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942页。

“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杜威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他的论文:《与意志有关的兴趣》(Interest as Related to Will)发表在这个学会《1895年赫尔巴特年鉴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发表在这个学会《第二本年鉴》(1896)上;《教育学的伦理学原理之基础》(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载于这个学会《第三本年鉴》(1897)上^①。1901年^②,该学会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在这里,它脱掉了“赫尔巴特”的“帽子”。1910年再改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NSSE)^③。“20世纪初,原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像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等等,逐步地离开赫尔巴特学派,逐步地成为坚定的杜威学派了。”^④

就国际范围的潮流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全盛时期,也许是在1880年左右至1910年左右;20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在国际范围说,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它们有它们各自出现的时代。真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⑤。

从当时构建教育学的体系上来看,除了由译书而呈现的打有日人烙印的赫尔巴特式的教育学之外,还有一种是由清政府对教育学的学科内容、程度所作的规定中呈现的形态,这类“教育学”,几乎涵盖教育之任一方面。

① 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附录二杜威著作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

② 下列注③的三书中均误为1902年。见S. Jaszczak (ed.), 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 p. 7421. 1996.

③ F. Eby & C. F. Arrowoo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1934, 19th printing, p. 787, 1946; W. F. Connell,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p. 61. 1980; 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4—615页。

④ W. F. Connell,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p. 69, 1980. 参见康内尔著,张法琨、方能达、李乐天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140页;康纳尔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译,周定之、张文庭校:《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例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所设置的科目中，应包括教育学，其中大概涉及四部分内容：教育史、教育原理、教育法令及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安排的顺序为：“先讲教育史，当讲明中国外国教育之源流，及中国教育家之绪论，外国著名纯正教育家之传记，使识其取义立法之要略。但外国历代教育家立说亦颇不同，如有持论偏谬易滋流弊者，万万不可涉及。”“次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及中国现在教育之宗旨，及德育智育之要义，并辨学（日本名论理学）及教授法之大要。”“次讲教育法令及学校管理法，当据现定之教育法令规则，讲学校建置编制管理卫生筹集经费等事，宜兼讲关系地方治理之大要。”“次则实事授业，当使该师范学生于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盖初级师范学堂，在解说小学教育之理法不可过驰高远，以实能应用为主。其在附属小学堂实事授业，则以次使师范学生教授幼童；而师范各科教员及附属小学堂之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①。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颁布《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其中对教育学的学科程度作了如下规定：包括教育史、各科教学法、学校卫生、教授实事练习、教育法令^②。

《奏定学堂章程》中所言教育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大教育学，举凡一切与教育学有关之问题，均在教育学之列。这可以说还是一种混沌状态的教育学，论与史、学与术是纠结在一起不分彼此的，从中反映出的是国人当时对何谓教育之学的认识，尚不清晰明了。这种形态的教育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随着译书及自编书的大量增多，而日渐衰弱^③。

1914年以后，无论是翻译还是自编的教育学都大幅度减少，这一方面固然与甲午战争爆发，国人渐生抵日情绪不无关联，另一方面与北洋政府的一系列约束有关。

为了控制民众思想，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初成立了教科书编纂处，以及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和教授要目编纂会。教授要目编纂会的宗旨是

^{①②} 朱有璩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28页，250页。

^③ 当时，许多师范学校并未按这样的要求来编排教育学，如通州师范学校（现南通师范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的学课章程中规定：教育学授教育之宗旨及智育、德育、体育，又授伦理之大要，教授之原则。教育史则授中外各国教育之沿革，及中外各国著名教育家之传记主义方案之要略。这里，教育学与教育史就是分开来的。同上，第314页。

“编订教科书之参考，并示各学校以施教之正鹄”。其编纂范围以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限。其编纂类别分教育科、国文科、修身科、农业科等。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则以教育总长提出的方针和部定各科教则作为审查教科书的标准。

1914年4月，教育部发出布告：因前一时期审定教科书过于宽滥，因而限三个月内将这些书交部复审。据《教育杂志》第6卷第2期报道：“教育部训令云：查教育为国家之根本，教科书为教育之利器。教科书善良，教育始能进步。否则流弊亦不可胜言。民国成立之初，教科书出版尚少，本部不得不从宽审查。暂供各学校之用。今二年以来，教科书出版渐多，且民国自各国承认以来，国是业已大定。所有民国二年以前各商店所编教科书，经本部审定之本，亟应按照大总统教令，按切时势，妥为修改。自通令之日起，限定三个月内送部复审。以后新编之本，尤须特加详慎，以期精善。”同年8月28日，教育部饬和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提出审查教育科教科书应采用的方针是：“注重本国特殊之国民性，参合东西洋各种教育学说，标示中国的教育指针教练生徒，教育界方有革新之望。近世教育史教育制度等，尤宜注意，不可徒趋于理论之讲演。”

至1915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

附录：这一时期主要教育学著作的章节目录

由张子河编写，商务印书馆 1914 年版的《大教育学》，是当时流行较广的教育学教科书，先后印有 8 版。这本书的观点体系就来自于日本松本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是一本反映日本维新后的资产阶级教育学。在自序中，张子河谈到：

余初游学日本习普通学，于一切主要学科，皆得稍稍窥其门径，而惟教育一科非普通及所应有，不惟不好且并未尝一寓目焉。乙巳年（1905）冬归国，就职南京两江师范学校东文教习兼翻译。翌年春，适有日本教习松本孝次郎应聘来华主讲本校教育，校长李梅庵先生命余为之译，先后同事六、七年，余因得于教育一门，耳闻目染，口传心诵者数十遍。洎后本校增加学级扩充学额，每周应有之教育时间，溢出日本教习原订应授时间之数，校长委余分担十小时，余于编纂日文讲义外，故有大教育之著。但其原本，实草创自日本教习松本、松浦二氏之手。余为中国产，思欲讨论修饰，以适合于中国教育界之理想实际，遂不憚搜集近今东西人之明珠，参合而折中之，思想之崭新，资料之弘富，盖皆余事也。^①

^①这一时期，许多日本人在各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教习。宣统二年（1910 年）《本署司详复奉飭核议两江师范学堂日本教员请奏奖文》：“总教习日本文学士松本孝次郎，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到堂，除按钟点任教育学科外，兼总理各东洋教员课程，四年以来，孜孜不倦。”（载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59 页）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在开办之初的几年间，教育学由日本的中桐确太郎执教，郑晓沧先生忆道：“初开办之两三年中，有不少日籍教员。凡有八人，以博物科为最多，图画、音乐亦有日籍教员。而教育教员中桐确太郎尤为人所称道。此等日籍教师类皆有一定的专业造诣和修养，庄严肃穆，教学上颇能复杂，难得告假。”见郑晓沧：《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载《杭州大学学报》，1959 年第 4 期。

该书共分 7 编：

第一编，绪论。共六章：教育学之起源；教育之意义；教育之效力及
限界；教育之必要（个人方面、社会方面）；教育学与术之关系；教育学
之范围及与其他科学之关系。

第二编，教育者论。共二章：教育者之天职；教育者之资格（身体上
之资格，精神上之资格）。

第三编，被教育者论。共九章：概说；被教育者身体之组织；身体发
育之顺序；身心之关系；心之所在与特质；知情意；个性及男女性；被
教育者之社会的关系；教育期之区分。

第四编，目的论。共四章：意义及关于目的论之诸家见解（关于教育
对象之见解，关于教育目的与人生目的之见解，关于社会与个人之见解）；
关于目的思想及历史的变迁；教育之十原则；结论。

第五编，教授论。共九章：教授之意义及目的；教授之心理以及理论
的基础；教材之选择及分类（修身、语学、历史、地理、理科、数学、图
画、手工、音乐、游戏、体操、裁缝）；教材之排列法（ZH直进法、圆
周的循环法、中心统合法）；教授细目教案及日课表；关于教授方法之三
条件；形式的阶段（教授概括的知识之阶段，教授事实的知识之阶段，教
授技能的知识之阶段）；教式（注入式、开法式）；教态。

第六编，训育论。共六章：训育之意义及目的；训育之二主义（服从
主义、道德自由主义）；训育与教授之关系；训育之心理的基础〔意思
（识）之要件，意思（识）陶冶之法，品性〕；训育之统一（家庭训育、
学校训育、社会训育）；训育之方法（教授、示范、游戏体操、作业、权
威、命令、惩罚、褒赏）。

第七编，学校论。共三章：教育场；学校系统；各种学校（普通教育
之学校，职业教育之学校）。